

澳門的傳媒生態變遷 與網絡新聞實踐

● 林仲軒、劉世鼎

摘要：澳門回歸以來，特別是在全球網絡新聞大浪潮之下，網絡新聞得以蓬勃發展，並且正在衝擊傳統媒體，改變了既有傳媒生態以及新聞生產、流通與消費邏輯。本文通過案例研究，梳理了互聯網時代澳門傳媒生態的變化，特別是互聯網如何創造更為多樣化的傳播主體，以及網絡新聞實踐如何打開另類公共空間——從日常生活中的社會監督，到針對壟斷企業的文化干擾行動，再到直指政府官員甚至是政府體制的政治動員，以期把握新聞與政治文化之間複雜的動態關係。

關鍵詞：網絡新聞 傳媒生態 社會監督 文化干擾 政治動員

一 引言

2017年9月17日，年僅二十六歲的澳門青年蘇嘉豪以9,213票、得票第十二位當選澳門特區第六屆立法會議員，成為澳門歷史上最年輕的立法會議員。這個結果令許多向來關注澳門政治的人感到十分意外。實際上在2017年底，由「青年」(youth)和「震盪」(quake)兩個單詞組成的「青年震盪」(youthquake)一詞成為了《牛津詞典》(*Oxford Dictionaries*)的年度詞彙，指涉由青年人的行為或影響所產生的社會政治變革。這一波青年震盪可以說席捲全球，法國、英國、新西蘭、澳大利亞等都看到年輕人所展現出來的前所未有的政治、社會能量。在澳門，以青年為動員對象的蘇嘉豪在《訊報》發表評論文章〈青年震盪席捲不容忽視 總會還給他們一點顏色〉^①，可以看出澳門已經成為全球青年政治參與趨勢的一個組成部分。但與歐美二十世紀60年代

*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項目編號：19YJC860027)的資助。
作者感謝兩位匿名評審及編輯部老師的寶貴意見。

戰後「嬰兒潮」一代不同，這一波青年震盪的主體「千禧世代」出生並成長在互聯網傳播通訊技術迅猛發展的時代。因此，我們認為要理解澳門「史上最年輕議員」的出現乃至其背後邏輯，需要先考察澳門互聯網的發展及其對傳媒生態和青年網絡世代的深刻影響。

相較於臨近地區，澳門的互聯網發展起步稍晚，在1995年才開始試驗性地向公眾提供國際互聯網服務，在1999年回歸之前，澳門居民上網率只有10%左右，但截至2018年，澳門居民的上網率已經高達84%，這一比例遠超過全球的平均水平（54%）；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尤其迅速，2018年澳門網民中通過手機上網的比例已經達到96%^②。通過互聯網獲取資訊特別是新聞信息，是澳門網民使用網絡的首要目的，同時也是最主要的網絡實踐形式之一，而Facebook、微博等社交媒體在澳門的發展和普及給澳門網民特別是青年網民提供了網絡新聞實踐的新可能^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互聯網以及移動互聯網的發展深刻影響了澳門的傳媒生態，繼而成為回歸以來推動澳門社會變遷的一個重要因素。

本文試圖從澳門網絡新聞實踐切入，考察在資訊科技革命和全球網絡新聞浪潮下，澳門自回歸以來的傳媒生態變遷及其帶來網絡民主的可能性。由於新聞媒體在保障公眾知情權、揭露腐敗、監督政府等方面的作用，其與民主政治的緊密關係一直為學界所關注和期許。互聯網的普及激勵了學界對網絡媒體能否帶來新的民主形式的想像，催生了一系列嶄新的新聞概念^④，而這些概念也已在很大程度上逐漸被澳門媒體和網民吸納到廣泛的媒體實踐中，重新形塑了傳統新聞生產、流通與消費的邏輯，以及新聞與政治文化的關係。

二 網絡新聞及其可能性

從歷史演變來講，網絡新聞並不是全新的事物，實際上，任何媒體都曾經是某一歷史時期的「新媒體」，任何新聞實踐也都根植於既有文化體系，其之所以被稱為「新」，只是因為它具有以往媒體和新聞實踐所不具備的某些特質。比如，較之以紙為媒介的第一媒體、以電波為媒介的第二媒體和基於圖像傳播的第三媒體，網絡媒體作為第四媒體或者「新媒體」，其新聞生產就兼具了數位化、多媒體、超連結、即時性、交互性、虛擬性、定制性、參與性等特點^⑤。

根據這些特點，一些傳播學者發展出了「公民新聞」、「草根新聞」、「公共新聞」、「參與性新聞」和「民主新聞」等一系列新概念，指涉仍處於被不斷更新狀態的「網絡新聞」(networked journalism)^⑥。特別是近二十年資訊技術和數位媒體的快速發展，促使新聞傳播學界對網絡新聞的研究興趣愈來愈濃厚，關注互聯網使用者如何變成網絡新聞中的一個節點，收集、處理與發布新聞資訊。正如論者所說，「新的事實每天都在被挖掘出來；更多的觀眾回饋正在被整合起來；更多的聲音正在被聽到；同一新聞報導的更多不同的觀點正在

被呈現出來；更多的故事正在被發現、存檔並在更長時間內可被搜索到；更多的有權力的人正在被更密切地注視着；而更多的人正在更積極地參與到世界的變化中來——通過拍照、拍攝關鍵時刻的視頻，或者通過評論博客，或者通過分享自己重要的故事」⑦。

在這個語境下，網絡新聞對傳統媒體和新聞模式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衝擊。比如有學者認為，互聯網情境下「人人皆媒體」的形態是從根本上對傳統媒體和新聞做出的回應、挑戰甚至是反制⑧。隨着互聯網全面滲透並且深入影響了新聞生產、傳播和消費流程，新聞範式也面臨深刻的轉變。基於這種新聞範式轉變，許多學者認為網絡新聞在很大程度上對網民實現賦權，即網絡新聞的參與體現了一種新的民主形式⑨。這是因為網絡新聞模式很大程度上模糊了新聞生產與消費的界限，甚至讓樂觀期待的「消費生產一體化」(prodsage)新聞模式成為可能，使網民在充當新聞消費者的同時，也轉變成為新聞生產者、發布者和傳播者，成為了網絡新聞的「產消者」(prosumer)⑩。這種使傳統被動的新聞消費者轉變成為較為積極的新聞生產與消費者的「產消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傳統媒體和新聞生產的「把關人」限制，傳統媒體組織難以再完全壟斷新聞資訊的搜集、整理、過濾、選擇、處理、加工和傳播的完整鏈條和每個環節，而普通網民公眾能夠參與其中並在一定程度上充當「自我把關人」的角色。網民既利用集體智慧、更具創意的網絡表達形式，也借助這種去中心化的模式，直接「在傳統的機構與組織框架之外，形成共同分享、相互合作、集體行動」的新的新聞生產模式⑪。

這種繞過傳統新聞「把關人」的「產消者」新聞範式，被許多學者認為帶來了民主的可能性。網絡新聞模式使「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新聞工作者」，這成為人人均可享有的一種權利，即每個人都有權利去表達、交流自己的資訊和觀點⑫。這種人人皆有、皆能的表達權利，實際上是對社會權力進行去中心化、去神秘化的過程，被學者視為能夠促成社會的「權力轉移」，即權力從傳統的精英階層向普羅大眾轉移，從而促進社會權力的公平化，並最終打開民主化的新可能⑬。這種基於網絡新聞模式的民主化新可能被認為是一種「分子狀態的民主」(molecular democracy)，因為它不再依賴於龐大和封閉的新聞機構和政府政黨，而是借助去中心化的、更廣泛的、更深入的協作網絡⑭。甚至有學者認為，基於這種網絡新聞模式形成的上述種種抽象概念，已經成為了一種普遍的信念和信仰，這種信仰本身就已是一種強大的改造社會的力量⑮。

當然，也有許多學者對這種過度樂觀的態度提出批評。比如，麥克切斯尼(Robert W. McChesney)認為網絡新聞仍然是在特定的政治經濟結構下的產物，屈從甚至服務於特定的商業壓力和商業利益，並不具有真正的民主解放潛力⑯。米勒(Toby Miller)甚至認為將網絡新聞與民主模式關聯起來本身就是一種不切實際的互聯網崇拜⑰。總體而言，對網絡新聞民主潛能持樂觀態度的學者還是要多於悲觀派，而學者之所以對網絡新聞充滿樂觀想像，一方面是因為過於強調新媒體技術的作用，忽視了技術的社會屬性以及技術背後的行動者和社會關係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把民主化約為一個宏大敘事的抽象概念或者多元參與範式，而不是行動者利用新媒體技術在特定社會情境下的

具體實踐過程。為了探索這種具體的實踐過程，本研究特別關注三個主要方面——社會監督、文化行動和政治動員——的具體實踐及作用。

首先，網絡新聞的社會監督功能是繼承傳統新聞監督的一種新發展。西方傳統新聞專業主義者往往以「第四權」自居，強調其對於政治權力和社會生活的「看門狗」(watchdog)角色和守望監視作用¹⁸。而網絡新聞被認為與傳統的組織化新聞媒體有同樣甚至更有效的傳播權力，因此對政治運作和社會公共事務有至關重要的民主監督作用¹⁹。有學者甚至樂觀地認為，網絡新聞能更獨立、更有效地在社會監督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充當互聯網時代的「黑幕揭露者」或「扒糞者」，或者所謂的「數字看門狗」²⁰。

其次，網絡新聞並不僅僅止於監督，往往還在此基礎上直接發展出文化干擾(culture jamming)行動。不同於傳統新聞基於組織化的新聞機構和新聞專業主義²¹，網民生產的網絡新聞並不依賴於專業化的新聞機構，其新聞平台同時是鬆散的網絡組織。網民往往會在監督揭露性報導的基礎上，發展出特定的文化干擾行動，展現其突破傳統媒體的潛力²²。這種文化抵抗形式在港澳地區尤其明顯，即在特定的網絡新聞平台對壟斷企業、政府部門和政府官員進行監督的同時，也會通過「惡搞」的方式表達對特定事件的不滿²³。

再次，網絡新聞與政治動員的關係已經被很多學者研究討論。第一，網絡平台的線上動員、溝通、參與、傳播成本較低，能相對容易地招募成員、組織行動和維持運動，同時網絡平台還凝聚了線下行動所必需的不滿、憤恨、憤怒、悲情等情緒²⁴。第二，網絡新聞平台能整合線上和線下行動模式，一方面將線上的網民討論發展為線下的街頭行動，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網絡平台直接支援和豐富線下行動的展開和創新²⁵。第三，網絡去階層化和去中心化的民主結構，有利於激發線下個體自我行動的積極性，從而組織分散式而非中心化、扁平式而非階層化的線下行動²⁶。

基於上述文獻綜述，本研究希望在傳統網絡新聞民主研究的宏大敘事和技術維度之外，在澳門傳統傳媒生態基本親官方立場的特定社會情境下²⁷，關注澳門網民在地的、具體的、日常生活的新聞實踐，希望藉此深入細節，把握新聞與政治文化之間複雜的動態關係，而不將其視為一個先驗的公理。我們主要的研究問題是：在新媒體科技的衝擊之下，澳門的新聞傳媒生態產生了怎樣的嬗變，這種嬗變如何通過其社會監督、文化干擾行動和政治動員的在地化實踐呈現出來，其背後又揭示了怎樣的權力關係？

為了回答這一研究問題，本文採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在具體的案例選擇上，標準並不在其普遍性而在其特殊性，有賴於研究者目的性、理論性和判斷性的選擇。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主要採用虛擬民族志式田野研究方法，即由研究者在網絡空間對特定對象進行觀察，並在虛擬、在線的網絡環境中進行民族志研究。針對網絡新聞的虛擬民族志一定程度上延續了傳統新聞編輯室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並展現出虛擬網絡獨特的闡釋能力和闡釋彈性。在具體的操作上，本研究的田野觀察從2011年持續到2017年，具體的觀察田野主要是澳門的網絡新聞空間，包括網站、社交媒體Facebook專頁、視頻網站YouTube頻道和移動手機應用程式(APP)等。

三 網絡衝擊下的澳門傳媒生態

澳門作為華文媒體最早的發源城市，誕生了中國第一份外文報紙《蜜蜂華報》(*Abelha da China*, 1822) 以及第一份中文期刊《雜聞篇》(1833) ⑳。但是，澳門畢竟只是一個六十萬人口左右的小城市，其媒體的發展空間十分有限，時至今日，主要的傳統新聞媒體已經式微(筆者的田野觀察和其他相關的調研都佐證了這一點)㉑。實際上，目前澳門所有註冊發行的十幾家報紙的總印數也只有十萬份左右，即使佔澳門報業總銷量八成的《澳門日報》也只有五萬份的日銷量，而有的報紙發行量甚至已經不過千份㉒。相對於傳統新聞媒體式微，網絡新聞媒體卻發展迅猛(表1、表2)，首先是傳統媒體通過建立新聞網站、Facebook專頁等進行網絡化轉型；其次是借鑒香港獨立媒體的發展經驗，依託於互聯網的獨立媒體也異軍突起，填補了澳門傳統傳媒生態中獨立媒體這一塊空白；再次是另類媒體從網絡新聞「惡搞」起家，但卻迅速發展成為正式註冊的媒體集團；最後是基於Facebook建立的新聞專頁，成為澳門網絡新聞生態中日益重要的一種媒介形式，對澳門社會與政治的影響愈益彰顯。

表1 澳門現有傳統媒體

媒介類型	分類	名稱	成立/開播時間
報紙(日報)	中文	《澳門日報》	1958年8月15日
		《華僑報》	1937年11月20日
		《大眾報》	1933年
		《市民日報》	1944年8月15日
		《星報》	1963年10月5日
		《正報》	1978年11月
		《現代澳門日報》	1987年3月18日
		《新華澳報》	1989年12月20日
		《濠江日報》	2008年3月28日
		《澳門晚報》	2010年9月8日
		《澳門時報》	1972年
		《力報》	2011年9月2日
	《正思今日澳門》	2005年	
	葡文	《句號報》(<i>Ponto Final</i>)	1991年12月18日
		《澳門論壇日報》(<i>Jornal Tribuna de Macau</i>)	1982年
		《澳門今日》(<i>Hoje Macau</i>)	1990年7月2日
英文	《澳門郵報》(<i>Macau Post Daily</i>)	2004年8月27日	
	《澳門每日時報》(<i>Macau Daily Times</i>)	2007年6月1日	

電視	電視台	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澳廣視」)	1998年2月
	有線電視台	澳門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2000年7月
	衛星電視廣播服務公司	澳門衛視股份有限公司	1996年
		澳亞衛視有限公司	2001年6月
澳門蓮花衛視有限公司		2009年1月	
廣播電台	公營	澳門電台	1933年8月26日
	私營	綠邨電台	1950年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的《澳門年鑒》及各媒體公布資料。

表2 澳門現有主要網絡新聞媒體

類型	代表媒體	網絡形式	備註
傳統媒體	《澳門日報》	Facebook 新聞專頁	51,444 人讚好，56,541 人追蹤
		YouTube 頻道	429 人訂閱，265 則視頻
		其他形式	APP、微信公眾號
	澳廣視新聞 (TDM)	Facebook 新聞專頁	49,851 人讚好，56,423 人追蹤
		YouTube 頻道	728 人訂閱，209 則視頻
		其他形式	APP、微信公眾號
獨立媒體	《論盡》媒體	Facebook 新聞專頁	44,599 人讚好，45,595 人追蹤
		YouTube 頻道	587 人訂閱，156 則視頻，單條視頻最高點擊量 5,800 次
	《自己報》	Facebook 新聞專頁	22,956 人讚好，23,078 人追蹤
		其他形式	微信公眾號
另類媒體	《愛睇日報》	Facebook 新聞專頁	105,417 人讚好，108,075 人追蹤
		YouTube 頻道	3,827 人訂閱，337 則視頻，單條視頻最高點擊量 9.8 萬次
社交媒體	「澳門良心」	Facebook 新聞專頁	12,644 人讚好，12,643 人追蹤
	「澳門人」	Facebook 新聞專頁	115,877 人讚好，116,008 人追蹤
	「愛澳門」	Facebook 新聞專頁	44,856 人讚好，46,225 人追蹤
	“IMT Channel”	Facebook 新聞專頁 (已註銷)*	35,134 人讚好，35,791 人追蹤
		YouTube 頻道(已 停更)*	1,330 人訂閱，22 則視頻，單條視頻最高點擊量 7.8 萬次

資料來源：根據田野觀察整理，備註資料截至 2019 年 6 月(*截止至註銷、停止更新前的田野觀察數據)。上述媒體大多設有網站，其中《澳門日報》網站的澳門地區訪問量排名三十五，參見 www.alexa.com/topsites/countries/MO。

說明：傳統媒體方面，選取了當前澳門發行量最大的當地報紙《澳門日報》以及收視率最高的當地電視台澳廣視；其他三類媒體方面，則選取了田野觀察中該類媒體最具典型性的例子進行分析。



近年澳門大部分傳統媒體（如《澳門日報》）都開始了網絡化轉型。（圖片由林仲軒提供）

（一）傳統媒體的網絡化

澳門自1995年正式提供互聯網服務以來，服務普及迅猛，網絡滲透率及家庭聯網率等資料均表明澳門已經進入了相對發達的網絡社會。在此背景下，2018年網絡新聞閱讀已成為澳門網民最主要（84%）的網絡活動之一^⑤。筆者的民族志觀察也發現，互聯網已成為大多數澳門網民日常最主要的新聞來源，甚至是年輕受訪者的唯一新聞來源。因應這一變化，澳門大部分傳統媒體（比如《澳門日報》、澳廣視等）都開始了網絡化轉型，在傳統的印刷版本和電視版本之外，通過互聯網發布新聞，同時側重網絡新聞互動、超文字和多媒體的功能。但是，從紙張到互聯網的延伸，並不一定意味着傳統媒體已經真正實現網絡化；傳統媒體往往只是添加了一個新版本的新聞，而其整個新聞生產邏輯和流程基本保持不變，依然依靠專業的新聞編輯室、編輯系統和專業記者等。從這個意義上講，澳門傳統媒體在一定程度上因應了網絡社會的發展而進行初階的網絡化轉型，特別是豐富了新聞版本，也建立了跨媒介新聞發布系統，但並沒有從本質上改變新聞生產的邏輯。

（二）獨立媒體的崛起

澳門不斷發展的傳媒生態也為獨立媒體提供了土壤，《論盡》媒體就是澳門獨立媒體的一個典型。所謂「獨立媒體」，是一種點對點的創新共同體，具有更獨立、更平等、更民主的特徵，與官方話語體系下主流媒體的意識形態完全不同^⑥。換言之，獨立媒體為新聞話語權的建構，提供了傳統媒體之外的其他可能。於2012年10月正式成立，標榜「獨立、公義、良知、多元」的《論盡》媒體便展現出澳門獨立媒體特有的在地化特徵。首先，《論盡》媒體出版刊物的發行方式與傳統獨立媒體不同。與大多獨立媒體的免費派發策略相異^⑦，《論盡》媒體自2013年5月正式擁有出版刊物（紙本月刊）開始，就效仿

傳統主流媒體，以售賣的方式公開發行。其次，《論盡》媒體的新聞來源與傳統獨立媒體不同。獨立媒體往往鼓勵其採編團隊充分利用「公開發表」(Open publishing)內容，或者直接從公民記者處獲取文章，但《論盡》媒體擁有由少量專業編輯和記者組成的採編團隊，其新聞報導大多來自採編團隊而非公民記者。最後，《論盡》媒體關注的新聞議題與一般獨立媒體不同。其關注議題更多地聚焦於澳門本地社會和政治問題，如澳門的土地荒、病態賭博、醫療政策、新聞自由和行政長官選舉等，對於大多獨立媒體關注的商業和企業利益問題卻涉獵甚少。

(三) 另類媒體的黨派與機構化

通常意義的「另類媒體」與固守專業性、真實性、客觀性原則的專業化、組織化甚至政府化的傳統媒體不同，往往基於線上平台運營，組織結構相對鬆散，也更樂於接受自由職業和業餘公民記者。澳門典型的另類媒體《愛瞞日報》也同樣展現出一些澳門特色。《愛瞞日報》粵語發音與澳門發行量最高的官方背景報紙《澳門日報》相似，版面仿照《澳門日報》，有「惡搞」的意味。《愛瞞日報》成立於2005年11月，其創刊號刊登於「新澳門學社」的官方出版物《新澳門》雜誌中，而新澳門學社是以「民主派」自居的澳門政治組織。換言之，《愛瞞日報》自誕生之日便屬於一個特定的政治團體，具有明確的政治立場，並堅持以諷刺漫畫和文章批評政府。雖然《愛瞞日報》依託新澳門學社而有較成熟的傳統線下分發渠道，但仍極為依賴互聯網，建立了自己的官方網站、Facebook專頁和YouTube頻道。得益於互聯網的普及，《愛瞞日報》並沒有像一般的另類媒體一樣去機構化^④，反而從一個側重諷刺的小報蛻變為具有專業媒體從業人員和遍布各管道的媒體；2012年12月更以「愛瞞傳媒」的名義正式向澳門新聞局提請註冊登記，成為一個官方註冊的媒體機構。

(四) 社交媒體作為獨立媒體和另類媒體的載體

過去二十年來，社交媒體在澳門的傳媒生態中發揮着愈來愈重要的作用。雖然本文強調澳門獨立媒體和另類媒體的特徵，但這並非意味着獨立媒體、另類傳媒和社交媒體是絕對分離、彼此毫無關聯的；相反，這些媒體之間並沒有一個絕對界限，並已經形成一種具默契的合作關係。澳門的獨立媒體和另類媒體會分享和傳播對方的消息，也會轉載相關的社交媒體內容；而社交媒體也成為獨立媒體和另類媒體的一個重要載體和傳播渠道。澳門大多獨立媒體、另類媒體以及活躍的網民個體都會通過Facebook開設專門的新聞專頁。以早年澳門知名的Facebook新聞專頁“IMT Channel”（已註銷）為例，該專頁是由澳門網民楊先生於2010年12月23日創立的，旨在「報導傳統媒體不會涉及的消息和新聞，保護澳門市民的知情權和公共利益」。楊先生是該新聞專頁的唯一「編輯」，而專頁發布的所有消息都是其專頁訂閱者在「爆料區」對

事件的報導，於是“IMT Channel”三萬多名成員就主動、自願地兼有了「讀者」和「記者」的身份，他們以報導、評論、分享新聞和資訊的方式對傳統媒體進行回應、挑戰和反制，特別是報導傳統媒體不會報導的消息和新聞。在這個意義上，這類社交媒體新聞專頁又類似於上述的獨立媒體和另類媒體。

上述新興傳播主體的出現，標誌着在網絡衝擊下澳門傳媒生態的嬗變，而這種嬗變並不限於傳媒本身，實際上也打開了一個另類的公共空間，為新的新聞實踐和可能的新聞民主作出鋪墊。1966年「一二三事件」^⑤之後，澳門的傳媒生態整體轉向了親北京官方和澳門政府的溫和保守立場，如論者指出，「往往沒有善盡傳媒對政府的監督作用，和對社會弊端的揭露和批判」^⑥，排除了必要的公共討論和政府監督。在很大程度上，傳統傳媒生態甚至是將媒體視為政府機器和社會權力集團所掌控的一種「官方公共領域」，被要求為「強化國家主義和發展主義的『共識工程』起到積極作用」^⑦。而上述新興傳播主體代表着多元、分歧、矛盾、爭論與衝突的論述場域，可以看作是傳統傳媒生態中被主流媒體霸權所排斥的、處於被支配地位的普通民眾爭奪話語權，並形成反抗霸權力量的「另類公共空間」^⑧。

相對而言，香港傳統媒體政治光譜的寬度更大，能容納更多不同政治立場——包括青年網絡世代——的政治表達，而且傳統媒體的政治影響仍然非常巨大，因此香港網民在訴求表達和政治參與的過程中，往往在利用網絡新興傳播主體的同時，也很重視傳統媒體如電視、報紙、電台等的運用^⑨。但是，當澳門網民特別是青年網民進行類似實踐活動時，往往更傾向於上述多元開放的新興傳播主體及其相應的另類公共空間。可見，新興傳播主體作為另類公共空間實際賦予了澳門網民傳播、對話與行動的權力，使他們得以繞開甚至挑戰傳統官方的傳播體系和論述權威，實踐多重的、非正式的、另類的、反抗的、表達不同體驗的、代表多元認同的自主傳播活動和公共傳播形式，並在具體的網絡新聞實踐中逐漸展現出新聞的另類想像。

四 網絡新聞實踐

隨着新興傳播主體的出現，回歸以來普通網民也逐漸成為澳門社會政治生態中不可忽視的行動者。有學者指出，歷史上新聞民主發軔於知情權、「第四權」甚至「無冕之王」等宏大敘事，但這些話語已有式微之勢，特別是在數字時代，逐漸轉向普通網民在網絡新聞中的參與和互動等微小期待^⑩。不過，澳門網絡新聞總體卻呈現出從微小期待向宏大敘事演變的不同趨勢，即澳門網絡新聞實踐開始於日常生活中的微小期待，最終指向體制層面的政治改革等宏大敘事。下文將具體通過澳門網絡新聞實踐——從日常生活中的社會監督，到針對壟斷企業的文化干擾行動，再到直指政府官員甚至是政府體制的政治動員的趨勢，進行梳理和解釋。

(一) 社會監督

與一般傳統新聞媒體監督政府的角色不同，澳門網絡新聞發軔於非常細微和生活化的日常監督，其受眾對傳統政治議題的關注度非常低，而更關心網絡新聞在日常生活而非政治參與中的監督功能。比如，筆者發現，除了《論盡》媒體、《愛瞞日報》和“IMT Channel”等關注社會問題外，網民還自發組織了各種Facebook新聞專頁，由普通網民充當草根記者，報導曝光相關社會問題並進行監督。

公共交通是澳門網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網民自發建立了多個Facebook新聞專頁和群組來曝光澳門道路交通問題並監督司機的不良行為。比如，對巴士司機的監督有「澳門實look司機惡劣行為監察組」（已註銷）、「澳門巴士監察情報站」等；對的士司機的監督有“Macau Taxi Driver Shame”等；對澳門道路問題的監督則有「澳門道路情報」、「澳門道路分享站」等。其中，有Facebook群組明確表示，希望組織網民對道路交通問題進行監察，從而進一步實現對政府相關部門的監督。例如，由普通網民成立的群組「澳門巴士監察情報站」首頁的自我介紹稱：「本人希望與各位居民一起，對所有親身目睹〔睹〕的巴士違規情況，以拍照、錄影、文字描述，以及改善意見，都集中在此網頁上，本人會定期約見交通事務局，向其反映相關的意見。誠邀全澳居民共同參與。」

同時，也有群組表示對澳門相關政府部門喪失信心，希望通過公民記者的網絡曝光對澳門交通進行監督，呼籲社會良知。例如，「澳門實look司機惡劣行為監察組」稱：「澳門車輛太多，道路太少。我們正在關注澳門司機的不良行為。監察組希望發揮公民記者力量，將看到的惡劣駕駛行為紀錄向大家發布，法律執行唔到〔無法執行〕，就由我們的良知去做起。」這個新聞專頁在2012年2月8日才成立，因為非常受歡迎而迅速吸引了28,026人訂閱，在同年8月9日甚至有1,454個訂閱者同時在線瀏覽並討論該專頁的新聞報導，這樣的「粉絲」數量和同時在線人數在當時只有五十五萬人口的澳門來說，是相當可觀的，相比當時澳門其他Facebook專頁和群組來說也非常罕見。該新聞專頁中的新聞均由網民自發採集、上傳、報導，而新聞專頁公告強調「本專頁轉載各網友的報料內容，一概不予負責」。這些新聞報導涉及澳門交通問題的方方面面，從巴士公司管理問題、巴士司機不良行為、交通事故、交通堵塞，到個人違規停車、闖紅燈甚至行人橫穿馬路等不文明行為。例如，有網民在該新聞專頁報導其在麥當勞吃午餐期間，發現一輛維澳連運公司（已結束運營）的巴士行駛至麥當勞門外黃線位置，隨後司機不顧車上的十多名乘客而自行下車到麥當勞用餐近十分鐘，導致車上乘客多有怨言。該網民用手機全程記錄了這一行為，並選擇在這個新聞專頁曝光。

除了關注交通問題，澳門網絡新聞在社會監督方面還關注消費者權益問題，也產生不少相應的Facebook新聞專頁。比如，「澳門nxxl shop苦主投訴」的成立就是由於網民林小姐懷疑其在澳門某家美妝店“nxxl shop”購買的產品是假貨，因此希望這個專頁能成為更多苦主爆料和投訴的公開渠道。這個專頁吸引了超過八千名網民關注，並逐漸成為了澳門網民對澳門地區購物欺

詐、消費權益等問題進行曝光報導的一個網絡新聞平台，甚至變為一個全新的媒體空間，並公開作出「我們只是要聽真話」的宣言。

澳門這些Facebook新聞專頁為關心相關議題的網民提供了一個方便的新聞平台，每個網民都可以通過這些平台生產、發布、消費和分享相關新聞。這些網絡新聞媒體如上述一些學者所樂觀預期的，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對網民的賦權，令每個人都能成為網絡新聞記者，曝光生活問題、討論社會議題和參與公共事務。特別是這些網絡新聞平台提供了特殊的匿名爆料渠道，使網民在參與網絡新聞生產時，其個人身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護，這種基於社交媒體的專屬匿名性已經被很多研究證明是鼓勵普通民眾成為公民記者的關鍵因素^④。

但是，這種社會監督功能不能因上述案例而被無限拔高，進而把這種互聯網時代的「數字看門狗」與傳統新聞的「第四權」等民主監督功能直接等同起來。實際上，已經有愈來愈多的學者對此提出質疑，甚至批評在此基礎上的所謂「第四權」概念本身只是「一個理想主義的概念」^⑤。本研究發現，澳門的Facebook新聞專頁確實承擔了社會監督的角色，但是這些「數字看門狗」並沒有直接針對政府和官僚體制，充當傳統西方話語中的「第四權」；相反，它們更多地在日常生活中扮演這種監督者角色，關注具體的社會問題而非抽象的民主理念或者民主體制的確立。

(二) 文化干擾行動

隨着澳門網絡新聞的蓬勃發展和新聞實踐的不斷深化，有些網絡新聞的關注議題開始從原本瑣碎的日常生活監督逐漸指向與政府密切相關的壟斷企業，如澳門的壟斷電訊商澳門電訊公司(CTM)和巴士公司維澳蓮運(因其車身為綠色而被澳門人俗稱為「綠巴」)等，並在新聞監督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出線上線下的文化干擾行動。以下主要聚焦於兩大新聞事件作為案例分析：「CTM斷網事件」和「綠巴事件」。它們不僅被傳統媒體、獨立媒體和另類媒體全面跟蹤報導，網民還成立了專門的Facebook新聞專頁跟進事件發展並組織相應的文化干擾行動，包括線上的「惡搞」文化創作和線下的抗議行為，而這些行動又被網民即時地報導到這些專頁上。

CTM是澳門最大的電訊和互聯網提供商和服務商，擁有澳門政府的特許經營許可證，所提供的服務與其高額收費完全無法匹配，偶發的網絡故障更是令澳門網民非常不滿。僅在2011和2012年，CTM就發生了四次大規模網絡故障。在「CTM斷網事件」中，每次故障都導致使用者要斷網幾個小時。但與澳門政府關係密切的傳統媒體往往僅簡單報導這類消息，並傾向於將斷網事件歸咎於外部因素如全球性網絡攻擊等^⑥。傳統媒體的此類報導手法令網民感到憤怒，於是紛紛化身為公民記者，在不同的網絡新聞平台通過各自的親身經歷跟蹤報導事件。有網民為進一步表達不滿，更成立了專門的Facebook專頁「澳門仆街網民」，不僅收集、爆料CTM的負面新聞消息特別是網絡故障情況，還通過新聞報導的形式動員與策劃線上和線下實際的文化干擾行動。

首先是線上的「惡搞」行動。過去幾年「惡搞」已成為澳門、香港和中國內地非常流行的文化抗議形式，主要是充分利用各種文化資源，將不同資源中的圖像、雙關語、歌曲和視頻等有趣但原本無關的符號相結合，轉化成為意想不到的具有諷刺、幽默意涵的形式，展現戲劇性的效果^④。比如網民將當時熱播電影《保持通話》的海報惡搞成「冇得通話」（不能通話）而引發網絡上的強烈反響。其次是線下的「惡搞」行動。「澳門仆街網民」專頁的成員選擇在2011年5月17日世界電訊日聚集於CTM公司門口，以「仆街」^⑤的「惡搞」形式進行抗議，現場活動又被網民即時報導到各網絡新聞平台，在網絡上引起強烈反響，很快就有超過三千個評論。這一文化干擾路徑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實際成果，CTM不得不派出管理層與抗議者進行談判作出安撫。

類似的文化干擾行動在過去幾年屢見不鮮。網民抗議另一壟斷公司維澳蓮運的加價提議，也基本延續這一行動路徑。「綠巴事件」的導火索是2012年3月5日一名八旬老婦乘坐綠巴到站後尚未站穩，綠巴便過急開車，碾壓老婦致其生命危殆，需截肢保命。事件一經曝光便迅速在網上引起極大迴響，澳門網民的怨憤開始在網絡爆發。網民在Facebook開設了「維澳蓮運內幕暴光」、「要求澳門政府處罰維澳蓮運！踢走不合格服務！」、「打倒維運！」、「維澳蓮運交通意外事故報告」等新聞專頁和群組，匯集網民對綠巴以及相關的交通、民生、社會議題的意見。這些新聞專頁迅速吸引了眾多網民關注並參與討論，而討論議題也從對老婦的同情轉化為對社會問題的不滿，以及將對綠巴的不滿和憤恨擴散為對澳門政府的質疑和不滿。

比如，有網民在名為「要求澳門政府處罰維澳蓮運！踢走不合格服務！」的Facebook專頁（已註銷）中發布一張名為「穿梭小城，『維』害你我」的拼接圖片，以「惡搞」的形式匯集綠巴的交通事故照片，批評綠巴的服務，並希望與政府對話，要求相關部門承擔責任。而綠巴不僅不理會網絡輿論，還向澳門政府申請加價23%，令問題激化。網民的不滿情緒不斷發酵，針對綠巴和政府的「惡搞」作品迅速充斥網絡。比如，有網民製作「惡搞」漫畫，借綠巴與政府官員的對話諷刺綠巴有政府撐腰、官商勾結；有網民製作「陽光政府，照亮奸商」的「惡搞」海報，海報中的綠巴面露得意，並聲稱「河蟹政府包底，加幾多都得！」（有和諧政府撐腰，加多少都行！），而「陽光政府」則是當年澳門政府的施政綱領。

上述的澳門知名新聞專頁“IMT Channel”也介入事件，開始發起網絡民調並獲得超過六千名網民的點讚支持、超過兩千次的網絡分享和三百多名網民的留言討論，使網民得以通過這個網絡新聞平台積極參與到這一公共事件的討論之中。新澳門學社旗下的《愛睇日報》也對此大做文章，不僅製作大量「惡搞」作品質疑和譴責綠巴，也激烈批評政府未能恪守職責甚至官商勾結，向網民有獎徵集「惡搞」綠巴和政府的海報並結集為專題刊出。《愛睇日報》還成立「澳門巴士加價，我反對」等專門的Facebook群組，並基於新澳門學社的線下組織支持，開始發起街頭簽名、遊行示威等線下抗議行動，更直接地表達不滿和進行抗爭。

自此，澳門網絡不僅被打造成為「惡搞」式文化干擾的另類公共空間，更成為動員、聯絡澳門網民參與線下行動的重要工具；線上的「惡搞」批評也最終形成了2012年7月15日線下的要求政府撤回加價決定的示威遊行。遊行現場處處延續着網上「惡搞」式的歡樂氣氛，特別是行動者製作綠巴模型，再現「街頭綠巴事故表演」等。這些「惡搞」式的線下表演吸引到媒體採訪以及市民的圍觀和參與，其照片和報導又被及時上傳到相關Facebook新聞專頁供網民討論。因此，事件從線上到線下，又從線下到線上，形成某種正反饋，引發強烈的社會反響。澳門政府最後退讓，直接撤回綠巴的加價申請方案。

在這個過程中，澳門網絡新聞不僅展現出其社會監督功能，更在線上和線下實現了文化干擾功能。這種文化干擾功能往往被傳統新聞研究所忽視，因為傳統研究更關注主流媒體在各種文化和社會行動中的作用，而愈來愈多的學者對網絡媒體和網絡新聞寄予更多的希望，期望網絡媒體能夠對文化和社會行動提供參與、爭議、互動和創新的另類空間，並挑戰傳統主流媒體的霸權地位^④。澳門網絡新聞的文化干擾功能正以其自主的、創新的、抵抗的和另類的文化實踐展現出其提供這種「另類願景」的可能。但是，澳門網絡新聞的這種文化干擾功能往往只着眼於具體的事件和訴求，而並不是許多學者所樂觀期許的那樣，會對現實社會帶來根本性的影響^⑤；相反，它更多地還是在細微的行動層面打開更多可能的空間。換言之，即使其相對於上述社會監督功能已經更進一步而有了行動意義，但更多的仍是網絡新聞的微小期待而非宏大敘事。

（三）政治動員

網絡新聞的文化干擾功能讓澳門網民和行動者看到了更多的政治參與可能性，甚至發展出更宏大的政治理念與改革訴求。網絡新聞平台不僅給澳門網民開闢了另類公共空間，也提供了線下集會、遊行、抗議、請願、靜坐、佔領等政治行動的動員、組織、傳播渠道，浮現出從線上到線下的政治參與路徑，並發展出更有組織的、指向政府高官甚至直指特區政治體制的集體行動。

本研究發現，澳門近年來有愈來愈多的網絡新聞平台，如Facebook新聞專頁《愛睇日報》、「澳門良心」、「愛澳門」等，已經不滿足於上述的社會監督和文化干擾，而開始利用網絡新聞平台對線下政治動員的積極作用，組織大型的線下政治行動。它們平時特別側重報導特區政府和官員的負面新聞，而一旦有負面新聞事件發生便會大肆宣揚，營造網絡輿論，進而組織線下行動，比如近年澳門比較重要的「反離補」大遊行和「回水一億」行動，都是由這些網絡新聞平台依循上述動員邏輯實際動員組織起來的。

2014年5月25日的「反離補」大遊行是澳門回歸以來參與人數最多的示威遊行，估算約有兩萬人參加，相當於當時澳門每二十三人中就有一人參與遊行（2014年澳門人口只有五十六萬）^⑥。遊行主要由「澳門良心」發起和組織，並得到眾多網絡新聞平台（如「愛澳門」）的響應，主要目的是為了反對澳門政府提案的《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法案（即《離補法》），該法案不僅讓特首在任期內享有刑事豁免權，還為特首和主要官員每

人提供數百萬澳門元的一次性離任補償以及長期的離任「長俸」（離任特首每月18.9萬澳門元）。這次政治行動源於網絡新聞平台的持續跟蹤報導和曝光，因為親政府的主流媒體不可能負面報導《離補法》；網絡新聞報導吸引了廣大網民的關注，特別是當政府及主流媒體無法做出合理回應的時候，網絡新聞更取得了網民的信任。當網民都湧到這些網絡新聞平台獲取「非主流」資訊時，後者便能凝聚甚至放大網民的不滿和憤怒等情緒，成為這次大型遊行的重要基礎；而網絡新聞平台之間的水平結構關係亦為平台間的互動和聯合提供了組織大型行動的有利條件。

2014年5月14日，《愛瞞日報》Facebook專頁首先發起了一場名為「一人一反離補」的線上抗議活動，網民紛紛上傳自己舉牌「貪官離補，實在離譜」的照片到該專頁上，牌子上還統一用一頭肥豬代表官員。之後，新澳門學社及其相關網絡新聞平台，如「澳門良心」、「愛澳門」等也相繼行動，發起各種線上抗議和線下街頭簽名抗議等行動。5月20日，「澳門良心」的周庭希（當時亦是新澳門學社副理事長）及其他兩位負責人到澳門政府總部及立法會提交請願信，要求撤回法案。請願現場照片被同步上傳到「澳門良心」Facebook專頁，用於發起「反離補·反特權·撤法案」的「5·25遊行」以及「5·27着白衫包圍立法會」的「佔領行動」，並邀請其群組的46,000名網民參與。5月25日遊行抗議當天，組織者稱有超過兩萬名（警方則估計有七千名）市民參加了遊行，成為澳門回歸以來規模最大的遊行抗議活動⁴⁹。抗議者用中文、葡文、英文等寫了各種標語，並高喊這些標語表達自己的憤怒，除了之前網絡上常見的「貪官離補，實在離譜」標語和「肥豬」形象，還有「濫用權力」、「苛政猛於虎」、「高官自肥可恥」、「貪官合法打劫市民」、「撤回加幅，還我生活」、「漠視民意，死路一條！」、「反貪官，反惡法，要民主」、「不講市民心，高官講酬金」、「特首貪心無能輩，庸官改法愛錢財」、「月入廿萬要離補？無能官員離晒譜！」等標語。

此外，上述諸多網絡新聞平台又成為現場報導遊行的媒體和進一步凝聚參與者情緒的平台。這些現場報導甚至成為了《澳門日報》等傳統媒體和《論盡》傳媒等獨立媒體的重要資訊源，這有利於行動組織者以其傾向視角傳播新聞資訊，進一步擴大影響並吸引更多人參與。5月25日當晚，澳門行政會召開緊急會議應對，要求將法案重新提交立法會審議。26日，行政長官崔世安提出取消立法會原定於27日討論《離補法》草案的議程。但抗議者並不滿足，打出「我哋係要撤回，唔係暫緩」（我們要的是撤回，不是暫緩）的口號，並繼續推進27日包圍立法會的行動。27日下午，市民學生下班放學後陸續穿白衣到立法會前草地聚集，當晚最終有逾七千人包圍立法會，他們高舉手機、開啟燈光，照亮廣場，一起高唱經典粵語歌曲《海闊天空》，並高喊「撤回」、「撤回」、「撤回」。29日上午，崔世安宣布，將致函澳門立法會正式撤回《離補法》草案。這時，「澳門良心」等幾十個網絡新聞平台才宣布「勝利」，並將這次抗議行動稱為「澳門更廣泛民主運動的開始」⁵⁰。

2016年5月15日的「回水一億」行動也基本遵循這一動員邏輯，且更加駕輕就熟，行動組織者在此之前已經有意識地總結經驗、積累素材、做好準備。5月5日，澳門政府決議通過澳門基金會，向暨南大學捐贈一億人民幣用

以興建港澳學生宿舍，但澳門政府和主流媒體並未主動報導此事和進行積極溝通，於是再次被新澳門學社及「澳門良心」等網絡新聞平台抓到機會曝光事件，並發起對該新聞事件的討論。同時，組織者和討論者還通過創作「豬頭」、「自肥」等「惡搞」形式的海報，表達不滿、憤懣，明確提出「回水、下台、改革」的政治口號，動員網民參與15日的線下遊行。最終，當天有超過三千人參加遊行，示威者繼續把原本新聞平台的「惡搞」形式延伸到線下，在遊行過程中高舉網絡上的「惡搞」海報，高喊「反對利益輸送」、「改革捐贈制度」等政治訴求，而這些線下街頭行動又被參與者實時報導到上述各網絡新聞平台。

最後要強調的是，這些網絡新聞平台及其政治動員和政治行動實際上都與新澳門學社這一政治團體密切相關，要麼是其附屬機構，要麼由其內部要員成立，是服務和服從於其政黨目標和利益的，主要組織者、參與者如蘇嘉豪既是「澳門良心」的創始人又是新澳門學社的時任理事長，他憑藉這些政治行動迅速積累政治資本繼而參與澳門立法會選舉並獲得席位。由此可見，澳門網絡新聞實踐從微小期待到宏大敘事，從線上到線下，逐漸對澳門的現實政治生態產生實質性影響，而且這一漸變過程是與特定政治團體的推動密切相關的，不是一個純粹網絡新聞現象的必然趨勢。

五 結語

過去二十年互聯網的發展不僅催生了「公民新聞」、「草根新聞」、「公共新聞」、「參與性新聞」和「民主新聞」的概念，也促成了新的傳播主體的興起。在這一全球網絡新聞大浪潮之下，澳門的網絡新聞實踐有其在地特徵。首先，澳門網絡新聞的社會監督往往指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社會問題，而非宏大的政治體制或者抽象的民主概念；其次，澳門網絡新聞也起到文化干擾的作用，但這種文化干擾往往着眼於具體的事件和訴求，而非根本性的社會變革。

這些特徵不僅展現出澳門網絡新聞實踐的在地性，同時也呈現出網絡新聞改變傳媒生態的潛力。在我們看來，澳門網絡新聞實踐的現實意義並不僅僅在於其在傳媒生態內部如何變革新聞範式而衝擊傳統媒體，而是在於其改變了整個澳門傳媒生態而深刻影響回歸後的集體社會情緒，這才是互聯網傳播所創造的主體性意義所在。在澳門的傳統傳媒生態中，報紙、電台、電視台等傳統媒體均以「愛國愛澳」為基本立場，以「澳媒澳辦」為主要方針，與澳門特區政府保持高度一致^⑤。受這一傳媒生態的影響，澳門往往被看作是一個「寧靜的小城」，澳門人則是沉默、樸素、不愛衝突、不會抗爭的小市民，澳門社會也是一個相對安寧、平和、和諧的社會^⑥。但本文所呈現的各種網絡新聞實踐正在迅速衝擊甚至改變澳門社會主體形成的方式。隨着傳播主體的多樣化及去中心化，澳門社會與政治文化的變化也日漸明顯，2014年的「反離補」大遊行被看成是為澳門社會和政治的轉捩點^⑦，顯示出這一變化的深刻影響。

實際上，傳媒生態視角將傳媒視為基礎性的生態或者環境，突顯傳媒與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社會因素之間的生態關係，強調傳媒對社會的生態

性影響^④。回歸以來澳門傳媒生態的變遷便逐漸顯現出其對澳門社會及政治的生態性影響，一是打開另類公共空間帶來新的政治行動路徑，二是塑造新的社會主體成為新的政治力量。首先，澳門網民藉由從線上到線下的新聞實踐打通了線上線下兩個原本分割的政治場域，形成一種互相增強的螺旋式放大模式，並最終聯合線上線下產生政治合力效果。其次，新的傳播主體的浮現也塑造了對政治參與日益積極的青年網絡世代，他們作為新的社會主體開始介入澳門的政治生態並積極參與街頭行動或者立法會選舉等，已經成為澳門一股新興的政治力量。因此，傳媒生態變遷的這種影響還將持續，未來如何演變值得繼續關注。

註釋

① 蘇嘉豪：〈青年震盪席捲不容忽視 總會還給他們一點顏色〉，《訊報》，2017年12月22日，P03版。

② 澳門互聯網研究學會：《澳門居民互聯網使用趨勢報告2018》（澳門：澳門互聯網研究學會，2018），頁7。

③④ Zhongxuan Lin and Yupei Zhao, "Towards SoMoLo Journalism and SoMoLo Activism: Case Studies of Macau Netizens' Digital Practices",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173, no. 1 (2019): 93-107.

④⑥ Sara Baase, *A Gift of Fire: Social, Legal, and Ethical Issues for Computing and the Internet*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Prentice Hall, 2008); Dan Gillmor, *We the Media: 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ebastopol, CA: O'Reilly Media, 2006); Bregtje van der Haak, Michael Parks, and Manuel Castells,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Networked Journ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6 (2012): 2923-38.

⑤ Mark Deuze, "The Web and Its Journalisms: Considering the Consequenc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Newsmedia Online", *New Media and Society* 5, no. 2 (2003): 203-30; Pramod K. Nayar, *An Introduction to New Media and Cybercultures*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0).

⑦ Bregtje van der Haak, Michael Parks, and Manuel Castells,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2923.

⑧ Shayne Bowman and Chris Willis, "We Media: How Audienc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July 2003), www.hypergene.net/wemedia/download/we_media.pdf.

⑨ Lincoln Dahlberg, "The Internet and Democratic Discourse: Exploring the Prospects of Online Deliberative Forums Extending the Public Spher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4, no. 4 (2001): 615-33; Dan Gillmor, *We the Media*; Howard Tumber, "Democr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Role of the Fourth Estate in Cyberspac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4, no. 1 (2001): 95-112.

⑩⑬ Axel Bruns, *Blogs, Wikipedia, Second Life, and Beyond: From Production to Producership* (New York: Peter Lang Inc., 2008), 2; 367.

⑪ Clay Shirky, *Here Comes Everybody: The Power of 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s* (New York: Allen Lane, 2008), 20-21.

⑫ John Hartley, "Journalism as a Human Right: The Cultural Approach to Journalism", in *Global Journalism Research: Theories, Methods, Findings*,

Future, ed. Martin Löffelholz and David Weaver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08), 48-49.

⑬ Brian McNair, *Cultural Chaos: Journalism, News and Power in a Globalised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06), 199.

⑭ James Curran and Jean Seaton,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The Press, Broadcasting, and New Media in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2003).

⑮ Robert W. McChesney, *Communication Revolution: Critical Junctures and the Future of Media* (New York: New Press, 2007).

⑯ Toby Miller, "Can Natural Luddites Make Things Explode or Travel Faster? The New Humanities, Cultural Policy Studies,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 *Media Industries: History, Theory and Method*, ed. Jennifer Holt and Alisa Perren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09), 194.

⑰ 郭鎮之：〈輿論監督與西方新聞工作者的專業主義〉，《國際新聞界》，1999年第5期，頁32-38。

⑱⑲ 姜華：〈公民新聞及其民主監督作用初探〉，《國際新聞界》，2013年第4期，頁38-46。

⑳㉑ Tom Felle, "Digital Watchdogs? Data Reporting and the News Media's Traditional 'Fourth Estate' Function", *Journalism* 17, no. 1 (2016): 85-96; 87.

㉒ Tim Jordan, *Activism!: Direct Action, Hacktivism and the Future of Society*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2); Christine Harold, *Ourspace: Resisting the Corporate Control of Cultur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

㉓ 劉世鼎、勞麗珠：〈網絡作為澳門的另類公共領域〉，《新聞學研究》，第102期（2010年1月），頁253-93；林仲軒：〈表演認同作為其他途徑的政治：澳門網民的實踐經驗〉，《新聞學研究》，第131期（2017年4月），頁127-71。

㉔ 楊國斌：〈悲情與戲謔：網絡事件中的情感動員〉，《傳播與社會學刊》，第9期（2009年7月），頁39-66；Zeynep Tufekci and Christopher Wilson, "Social Media and the Decision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Protest: Observations from Tahrir Squar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2, no. 2 (2012): 363-79.

㉕ Jeroen Van Laer and Peter Van Aelst, "Internet and Social Movement Action Repertoir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3, no. 8 (2010): 1146-71; Zhongxuan Lin, "Contextualized Transmedia Mobilization: Media Practices and Mobilizing Structures in the Umbrella Mov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11 (2017): 48-71.

㉖ W. Lance Bennett, "Communicating Global Activism: Strengths and Vulnerabilities of Networked Politic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 no. 2 (2003): 143-68; Manuel Castells,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 (Cambridge and Malden, MA: Polity Press, 2012).

㉗ 林仲軒：〈表演認同作為其他途徑的政治〉，頁127-71；支庭榮、湯敏華：〈傳媒監察力——以澳門報刊為例的分析〉，《東南亞研究》，2000年第4期，頁58-62。

㉘ 譚志強、吳志良：〈中國領土上的第一份外文報紙：澳門的葡文《蜜蜂華報》（1822-1823）〉，《新聞學研究》，第57期（1998年7月），頁213-28；林玉鳳：〈中國境內的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期刊——《雜聞篇》考〉，《國際新聞界》，2006年第11期，頁72-6。

㉙ 澳門互聯網研究學會：《澳門全民意指數研究報告2011》（澳門：澳門互聯網研究學會，2011）。

㉚ 〈澳門的新聞傳媒〉（2019年），www.gmw.cn/03zhuanti/2_zhuanti/jinian/macau/g30.htm。

㉛ 澳門互聯網研究學會：《澳門居民互聯網使用趨勢報告2019》（澳門：澳門互聯網研究學會，2019），頁6。

- ③③ Sara Platon and Mark Deuze, "Indymedia Journalism: A Radical Way of Making, Selecting and Sharing News?", *Journalism* 4, no. 3 (2003): 336-55.
- ③④ Chist Atton, *Alternative Media*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 ③⑤ 「一二三事件」是1966年12月3日在澳門發生的一次嚴重警民衝突及大規模群眾運動。衝突中有十一人被警察殺害，另有數十人受傷，導致當時的廣東當局介入，並令殖民政府賠償道歉。「一二三事件」之後，葡萄牙殖民政府的管治威信喪失，本地左派勢力則肅清了國民黨當局在澳門的勢力，並實際控制澳門、培植親北京的「愛國愛澳陣營」，而且成為日益穩固的政治力量。
- ③⑥ 譚志強：〈學習做一個中國新聞工作者：1999政權交接前後的澳門新聞傳媒〉，「海峽兩岸四地文化交流研討會」論文（台北：中華學術文教基金會，2003）。
- ③⑦ 劉世鼎、李巧雲：〈澳門電視的去政治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72期（2008年12月），頁289-308。
- ③⑧ 劉世鼎、勞麗珠：〈網絡作為澳門的另類公共領域〉，頁253-93。
- ③⑨ Francis L. F. Lee and Joseph M. Chan, *Media,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Mass Protests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2011); Francis L. F. Lee, "Media Communication and the Umbrella Movement: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 no. 4 (2015): 333-37.
- ④⑩ Chris Peters and Tamara Witschge, "From Grand Narratives of Democracy to Small Expectations of Participation: Audiences, Citizenship, and Interactive Tools in Digital Journalism", *Journalism Practice* 9, no. 1 (2015): 19-34.
- ④⑪ Peter Dahlgren, "Media Logic in Cyberspace: Repositioning Journalism and Its Publics", *Javnost-The Public* 3, no. 3 (1996): 59-72; Mark Deuze and Jo Bardoel, "Network Journalism: Converging Competences of Media Professionals and Professionalism", *Australian Journalism Review* 23, no. 2 (2001): 91-103.
- ④⑫ Shih-Diing Liu, "The Cyberpolitics of the Governed",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4, no. 2 (2013): 252-71.
- ④⑬ 「仆街」是一個常用的廣東話粗俗用語，指跌倒在地上，多用於咒罵別人，意思大概是「滾」或「去死」。
- ④⑭ Lynn S. Clark, "Cultivating the Media Activist: How Critical Media Literacy and Critical Service Learning Can Reform Journalism Education", *Journalism* 14, no. 7 (2013): 885-903.
- ④⑮ Rita Raley, *Tactical Media*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 ④⑯ "Macao Officials Giving Themselves a Golden Handshake", *Ming Pao*, 28 May 2014, D08.
- ④⑰ H. dos Reis, "Protest against 'Golden Handshake' Bill Draws Record Crowd", *Macau Post*, 26 May 2014, P1.
- ④⑱ E. Luk, "Macau Drops Hated Bill", *The Standard*, 30 May 2014, P06.
- ④⑲ 支庭榮、湯敏華：〈傳媒監察力〉，頁58-62。
- ④⑳ 林仲軒：〈表演認同作為其他途徑的政治〉，頁127-71。
- ㉑ 葉蔭聰：〈記下歷史轉捩點，記下團結奮鬥的一刻〉，載蘇嘉豪主編：《撤！還記得嗎？》（香港：嘉濤宮出版有限公司，2015），頁1-3。
- ㉒ Casey Man Kong Lum, *Perspective on Culture,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The Media Ecology Tradition* (New York: Hampton Press, 2006)；夏春祥：〈傳播的想像：論媒介生態學〉，《新聞學研究》，第125期（2015年10月），頁143-74。

林仲軒 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暨南大學港澳台傳播研究中心主任。

劉世鼎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傳播系教授